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女 博 士 后 研 究 丛 书

丛书主编：潘懋元

丛书副主编：肖海涛

知识经济时代 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 ——反思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若干重要问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成果 (09YJCZH070)

知识经济刚露端倪，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尚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无成熟的实践经验可归纳，但这正好为学者们充分阐发心中的一流大学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追求提供百家争鸣的机会。值此之际，李仙飞博士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理论在研究型大学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及发展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反思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

李仙飞◎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女 博 士 后 研 究 丛 书

丛书主编：潘懋元

丛书副主编：肖海涛

齐时代 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

——反思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若干重要问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成果（09YJCZH070）

李仙飞◎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内 容 提 要

知识经济刚露端倪，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战略性计划。中国政府为实现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与高等教育强国，也已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行动。

值此之际，李仙飞博士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理论在研究型大学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及发展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反思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参与谢作栩教授主持的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本书体现了以上项目的共通部分，表达了作者对世界一流大学美好理想与严峻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反思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若干重要问题/李仙飞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

ISBN 978 - 7 - 5361 - 3861 - 2

I. 知… II. 李… III. 高等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872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510500

营销电话：(020) 87553335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5.5 印张

字 数 304 千字

印 数 1 ~ 2 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社会迈进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创造、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科研与教育系统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建设卓越大学,即世界一流大学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声浪日益高涨,引发了一场“追求卓越”大学建设潮,如韩国的“韩国脑力 21”(Brain Korea 21)、日本的“21 世纪中心(COE)计划”、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 2004 年执政时期提出的“精英大学”计划、中国台湾的“五年五百亿顶尖大学及研究中心计划”,等等。

当今的中国政府为实现现代化,也通过“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计划,力争打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中国所要建设的“一流大学”是什么?它与世界一流大学有何共性?又有自己的什么特性?如何建设?这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所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知识经济刚露端倪,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尚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无成熟的实践经验可归纳,但这正好为学者们充分阐发心中的一流大学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追求提供百家争鸣的机会。值此之际,李仙飞博士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主持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反思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撰写了《反思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若干重要问题——基于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的视角》研究报告。本书是在此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共分上编、中编、下编三个部分。上编系统地概述了已有研究的理论成果。中编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描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观背景。下编从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意识形态等问题剖析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理论和实

践问题：作者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历史时代理论出发将知识经济的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力图回答“如何借鉴、构建世界一流的大学理念问题”、“世界一流大学成长与政府作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例如：第一，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来看历史时代，是超越意识形态、撇开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这是我们可以大胆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理论依据。第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是“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要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维视角考察，政府因素不可或缺。第三，如何正确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何正确对待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是世界一流大学指标体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的但远未解决的问题。第四，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来确立历史时代，是不能不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应正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避免在实践中的“泛意识形态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本书的突出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明确提出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探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敏感甚至让人忌讳的问题，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现存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所要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宝贵参照物，但现存的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必然是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准确定位，不可唯西方发达国家著名学府马首是瞻。检讨我国大学与西方著名大学的差距并缩小之只是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的部分但不是全部。同时，作者通过分析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性问题，论证了将“如何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关注范畴的必要性。

从学术研究价值看，作者论述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肯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的前提下，强调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民族文化特性，有其独到的眼力。在唯西方名牌学府马首是瞻的潮流中，此声虽是微弱，但却是引人注目的不同之音。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论证，对推动当前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现实意义看，该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方向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而使一流大学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第二，作者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基础又是中国的大学超越已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这一观点意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的因素，但由于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通过研究借鉴已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因素可以发挥其优势，从而给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带来全新的机遇。中国所要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又进一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继而超越现存“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作者坚信位于中国的一流大学一旦建成则将成为现存的“世界一流大学”效仿和追随的目标，从而为国家、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所以，作者赞成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准”，并呼吁有关政策文本中应明确这一价值诉求，以避免在理解上产生歧义。总之，上述两方面的新思想观点是最费作者心力的，但是，这两方面也可能是最为稚嫩并可能最易引起争议之处。不过，作者写作的目的之一，便是在思考学界热门问题中抛出自己的新见解、新问题，以期待学界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谢作栩

2009年4月于厦门大学颂恩楼

前言

知识经济理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是高等教育进入 21 世纪所要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它们并非孤立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虽然已经逐步转化成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要求，但仍缺乏明晰的价值观。

以往的研究由于对知识经济理解的分歧，同时由于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还处在摸索阶段，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本书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历史时代理论出发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给予相关的说明，在知识经济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建立辩证的联系。运用新视角，将知识经济的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成果（09YJCZH07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反思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中博基字 20060400739）。在此基础上，本书吸收了作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价值研究的部分内容而形成。主要依托以下两个重大项目：第一个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谢作栩教授主持的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侯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本书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寻找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性意义的根本所在及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难度的具体表现。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公认的棘手问题，它主要包括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问题等。另外，一些问题涉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外环境，诸如战略性地位的获得、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

与政府作用，等等。在本书看来，以上问题是我们考察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但学界主流的研究视角并未包括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与政府作用亦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后者经常被夹杂在各式各样的研究主题中附带提及，未见专门、系统的论述。

全书从多维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综合论证和考察，共分十章。第一章至第三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其对本书写作的启发和联系。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探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为我们清晰勾勒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性地位获得的全过程及其与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紧密联系。这样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包括：科教兴国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重大理论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等等。第七章出于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国际比较的考虑，选择了在各个不同版本的排名中不约而同地都名列前茅的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芝加哥大学创始人及最初八任校长的办学理念、耶鲁大学办学理念为着眼点，纵横比较办学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对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意义。第八章通过探讨美国联邦政府立法和政府科研拨款与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紧密联系，论证政府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的重要意义。第九章通过对世界级大学体系定量定性分析，阐明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复杂性，并通过以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个案详尽分析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性。最后一章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本书适于所有对以下两位长者的谆谆教导有强烈共鸣的读者。

用知识成就理想，用美德塑造人生。

——胡锦涛：用知识成就理想

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

——温家宝：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目 录

i 上 篇 i

第一章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1)
一、理性对待知识经济	(1)
二、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	(3)
三、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	(5)
第二章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概况	(12)
一、对世界一流大学成长有关政策的研究	(12)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研究	(16)
第三章 知识经济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30)
一、世界一流大学指标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30)
二、世界一流大学与国家创新体系	(31)
三、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与超意识形态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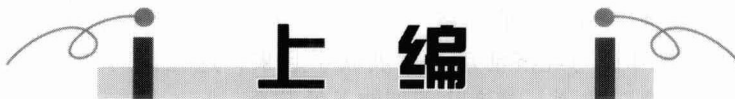
中 篇

第四章 中国高等教育战略性变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35)
一、战略性地位获得：重点建设重点大学	(35)
二、重点大学建设的新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40)
三、“985 工程”建设回顾及总体思路	(42)
四、简短评析	(45)
第五章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基础	(48)
一、科教兴国战略	(48)
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与高等教育强国	(57)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67)
第六章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基础	(79)
一、高等教育现代化	(79)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	(87)
三、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94)

下 篇

第七章 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及启示	(98)
一、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100)
二、芝加哥大学创始人及最初八任校长的办学理念	(104)

三、耶鲁大学办学理念	(117)
四、启示	(127)
第八章 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与政府的作用	(131)
一、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与政府立法	(131)
二、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与政府科研拨款	(137)
三、简短评析	(143)
第九章 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定量定性分析	(147)
一、排名指标定量分析	(148)
二、中国“985 工程”高校个案定性分析	(154)
三、简短评析	(174)
第十章 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	(177)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问题	(178)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182)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发展	(186)
四、以往人们对意识形态及其与大学之间联系认识的偏见	(189)
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意识形态的联系	(191)
六、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200)
参考文献	(209)
致谢	(231)
后记	(232)



上 编

第一章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以知识经济的理论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既是当前高等教育进入 21 世纪所要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的延伸。本章概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同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知识经济”概念进行澄清并认为:第一,我们不能盲目信从 OECD 对“知识经济”的解说,它虽然充满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技术性内容,但在总体上表现出过时的技术至上理念;第二,知识经济时代与以往时代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高文化产业”成为有待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有偿经济资源,成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动因;第三,正是依据对“知识”和“经济”的全新理解,人文社会科学才体现出不同以往的价值。在制定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战略和教育方针时,我们应当破除将人文社会科学与科技知识截然对立的观念,以制定全面发展的战略,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理性对待知识经济

要做到理性对待知识经济首先得全面认识知识经济。如何全面认识知识经济?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做了较为详尽的解答。^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 全面认识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观点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0 (2): 12-16.

该研究小组认为,我国目前有关“知识经济”的大量文献中,大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OECD)文件为蓝本。OECD 文件从经济的角度把知识视为一种可以市场化的资源,因而把“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又以知识为标准把现代经济视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全新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显然,把知识与经济活动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无论对“知识”、“经济”还是“社会”来说,都意味着理解上的革命。

但是,我们的问题恰好就出在对“知识”内涵的理解和描述上。应该注意到,OECD 文件所说的“知识”主要指科技知识,而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无关。它在描述“知识经济”带来的变化时,只对这种变化的技术内涵、对表达这种技术内涵的指标系统津津乐道,而对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内涵则视而不见。

OECD 的相关文件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与西方国家内在的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景况和目标方面的原因有关。然而,在我国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献中,这些与西方实际密切关联的文件,被作为“基本理论”大量复制,教条化地应用于同西方的实际非常不同的中国社会。相比之下,下面的观点更经得起推敲。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离知识经济时代尚远。从现实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 OECD 主要成员国 5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以知识为基础实现的,若以此作为是否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准,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工业经济甚至农业经济的水平上。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至 2000 年,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 131 个参评国家中,有 24 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时期即由工业经济时代转变到知识经济时代。^①但“知识经济”在我国只能说是初露端倪,除了港澳台三个地区以外,我国仅有个别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正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但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可以说缺乏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的中国离知识经济时代尚有较大的时间距离。^②

OECD 把“知识经济”强调为“技术知识经济”,把“知识创新”解释为“技术创新”的看法,实质上是有其“前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概

①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程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9.

② 谢作栩.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理性思考 [J]. 新华文摘,2008 (3): 117 - 118.

念的理论来源。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创新”概念引进经济学。后人据此把经济创新活动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前者涉及生产活动内涵的创新,后者涉及生产活动条件的创新;自然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前者密切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与后者有些间接关联。将技术、技术性科学当做生产活动的唯一知识资源,当做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这就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即“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与“经济”相关性的典型理解。在OECD报告原本中,“知识经济”被表述为Knowledge-based Economy,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脱胎于阿·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理论,因为后者曾用“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分别概括“第一浪潮”(农业)和“第二浪潮”(工业),并把“第三浪潮”相应理解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他说:“在过去的第二浪潮经济中,土地、劳动和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而在第三浪潮经济中,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广义的知识包括数据、信息、观念、符号、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托夫勒的“第三浪潮经济”超越了狭隘的“第二浪潮经济”的内涵,它把大量文化因素也视为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并把这一点视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其实,这种见识并非托夫勒所独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观念(1973),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的“信息经济”观念(1982)以及尼葛洛庞蒂提出的“比特时代”观念(1995),都充分注意到了作为新经济因素的文化价值内容。然而,OECD文件承续的是另一个传统,即福莱斯特“高技术社会”观念的传统。它把目光局限于“科学、技术和企业的领域”,用熊彼特“技术创新”思想把托夫勒“第三浪潮经济”中的文化含义剔除出去,从而生成了技术至上观念的“知识经济”概念。这样的概念正是“工业经济”时代“知识”观念的遗留物。

二、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

从现实基础看,当下人们所说的“知识经济”只是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社会作用、影响范围与结果的一种概括。虽然它初见端倪,但其意义不能低估。^①不过,以实体性的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并不会为人类造就出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

^① 黄楠森.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对叶险明著《“知识经济”批判》一书的几点想法[J].哲学研究,2007(12):118-120.

和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尽管它的确在促使新的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产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的增长,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不需要通过斗争而只需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政治、经济等各种问题的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①。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的知识经济问题呢?如果我们对一个历史时代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潮流,就可能被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所迷惑,以至于迷失方向,丧失信心,甚至作出错误的决策,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灾难、造成损失。^②从根本上说,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靠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避免或消除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异化,这一点也是不能动摇的。这两点“不能动摇”,是被现代社会主义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③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确定历史时代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是从两个视角来划分社会形态的:以生产关系的性质为标准划分的经济社会形态,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技术社会形态。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视角来把握当今历史时代。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来确立历史时代,是不能不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而从技术社会形态角度来看历史时代,是超越意识形态、撇开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标志的、由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生产关系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和善于向他们学习,为自身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资本主义全盘否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④

但是,视角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本质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基本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

① 刘曙光. 知识经济与社会形态、历史时代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6): 4.

②④ 刘曙光. 知识经济与社会形态、历史时代 [N].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6): 34-37.

③ 黄楠森. 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对叶险明著《“知识经济”批判》一书的几点想法 [J]. 哲学研究, 2007 (12): 118-120.

基础。因此,在同一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从两个不同视角所确立的历史时代应该是一致的,互相吻合的。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①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由以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转为对话;由以前经济上的封闭、封锁、平行存在和发展转为开放、交流、交叉存在和发展。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形式更加隐蔽、复杂。知识经济客观上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这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能力,而知识和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最终必须是社会化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就目前国际公认的高技术产业化的八大高技术发展来看,每一种都把人类引向公有制。”^②

三、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

(一) 中国学者的研究

“知识经济”自引入国内论坛起,便引起教育理论界的关注和反响。从1998年到2001年间,发表了上千篇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论文,出版了十几部有关知识经济与教育的书籍。其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蔡克勇教授在《知识经济强烈呼唤产学结合》(1998)和《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1999)中阐述了我国要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历史性的跨越,须采取“依靠高等学校与工业界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方针,并详述了“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推进产学研结合”的思想;该中心的谈松华教授在《高教变革: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做准备》(1998)中,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大众化”、“创新性学习”、“选择性教育模式”、“社会化终身教育”等新观念;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培养目标》(1998)和《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探索》(2001)中,从社会经济的三大历史性转变入手,论述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培养目标的变革方向和重点;厦门大学高教所潘懋元先生在《发挥大学中心作用 促进知识经济发展》(1999)中,阐述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必将走进社会中心并发挥社会产业“孵化器”的作用,以及确保大学发挥作用的若干条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谢安邦教授在《理性地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1999)中,分析

① 刘曙光. 知识经济与社会形态、历史时代 [N].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6): 34-37.

② 吴季松. 知识经济 [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225.

了知识的应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关系，为高校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予以合理的定位；北京师范大学吴忠魁教授在《论知识经济与90年代日本大学的科研》（1999）中，分析了日本在应对知识经济挑战中将科技“追随型”战略调整为“创新型”的基本国策转变，以及大学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应改革举措；国家行政学院朱国仁教授在《挑战与创新：构建新经济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2001）中，论述了中国高等教育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方略：“发展、人才与办学”观念创新是先导，“管理与投资体制”创新是关键，“教育目标与过程”创新是核心，“产学研”创新是重点等思想。2001年以后，宏观的思想理论研究带动了广大高等教育理论 and 实践工作者进行广泛的、逐步深入实际的研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谢作栩教授所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课题“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与变革”就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专门和详尽的研究：（1）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地位的研究。（2）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职能演变的研究。（3）国外高等教育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政策与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4）中国高等教育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分析等。致力于解决如下问题：（1）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双重跨越”中的高等教育变革途径选择。（2）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职能系统的重构。（3）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大学—产业界—政府的螺旋式”的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翻译亨利·埃兹科维茨等著的《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从中人们认识到：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大学正在与更大的群体洽谈新的社会契约，为此，大学还列入了很多专门条款。以前的契约是以线性创新模式为论据，且认为学术研究知识对经济只能发挥长期作用。现在，则有实践证明发挥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都是可能的。大学似乎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学术革命：除了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分化，大学的经济功能正日益制度化。知识经济体制使得自由放任和积极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区分过时了。新的机会不是出现在现存体制中，而是出现于建立在知识重构基础上的体制重组中。为此，全球大学密切关注的是：在一个经历着激烈变革，要求大学进行彻底改革的石阶上，如何在这种框架内部保留它们最内在的特性？

总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以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的主题“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为标志。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在时任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现为终身名誉理事长的潘懋元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发言《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和薛天祥先生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总结报